

怀念于右任先生

张文生

于右任先生一代人豪，名满寰宇，民国之元老，人皆知之。其生平革命事迹的荦荦大端，自有国史记载，无庸我哓哓。兹仅就我追随先生 30 年中所知道先生的事迹，列举多端，作拾遗补缺之助，藉表我的哀思。

因反清被通缉潜赴上海

于先生原名伯循，右任其字也，清末举人。先生有《兴平咏古》诗 30 余首，对董仲舒、郭解、班固、公孙述、窦融、马援、班超、梁鸿、杨贵妃等人都有题咏，而以贵妃墓一首为嫉忌者所陷害，几至杀身。其诗曰：

误国谁哀窈窕身，唐愆祸首岂无因。

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先生以《兴平咏古》及其作品刻于三原，书名《半哭半笑楼诗草》。三原县令德锐见此书，认为大逆不道，向陕甘总督升允告密，升允再向西太后密奏，慈禧下旨升允缉捕于伯循就地处决。幸有三原盐店街恒盛药材店经理李雨田先生探知升允出奏之讯，派人驰赴开封，向参加会试的于先生报信，得以脱祸，逃命上海。

先生到上海后的活动，我知道的很少。据说，他先结交了几

* 作者当年系三原县西关民治小学教员，后任校长。

位名流，并进震旦大学肄业。那里的校长是马相伯先生。50年前，上海的日报（不是《申报》便是《新闻报》）上载，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先生对学生们说：“你们同学中有位刘学裕，沉默寡言，学习勤备，课余之暇，操哑铃锻炼身体……”刘学裕就是于先生为避祸而用的化名。他离震旦大学后，就在中国公学教文学。他在中国公学教书时，即以“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的悲愤心情与报仇决心^①，创办《神州日报》，以打倒满清、建立民国为主旨。执笔者都是海内第一流人物，如宋教仁、章士钊等。故《神州日报》有炸弹之称。先生的笔名是“骚心”。中经几番挫折，改报名为“民呼”、“民吁”、“民立”。报名曾经三易也。《民立报》有一支笔抵十万毛瑟（枪）之荣誉。报馆设立在租界，言论比较自由，可以大发议论，无所畏惧。但也因此即被清廷官吏所不容，勾通租界当局封闭报馆，逮捕先生，坐巡捕房。但先生仍旧坚贞不屈。因此中华民国之成立，先生鼓吹革命，振奋人心之功，有足多者。以故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论功行赏，先生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旋因南北议和，孙中山先生让总统大位与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仅仅有3个月的时间，虽做不出多少成绩，但令人难忘的是中国火车夜间行驶，是于先生任交通部次长职期间，力争而来的。当时，我国火车仅仅白日开动，为了安全，夜间停止行驶。先生力排众议，主张夜间照常行驶。他说：外国火车夜间能开，我国为什么不能开。只要遵守规矩，就可以平安无事。

于先生60寿辰时，我在南京。亲友送的礼物中特别令我注意

于先生第一次出潼关是为了到开封参加会试。第二次出关是为了潜行入关回家探视父病，返沪后有《再出关》之作。其诗如次：“目断庭闱怆客魂，仓皇变姓出关门。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万里归家才几日，三年蹈海莫深论。长途苦羨西飞鸟，日暮争投入故村。”

的是马相伯先生画的“秋收图”。含义很深，就是人若到晚年就要做出成绩，如同种田秋收，方不虚度一生。于先生对我说：马先生学画时年已 70，我才 60 岁，我如果学画还来得及。又说：我每次见到我们马先生，我就感到我的年纪轻了。先生一生积极，故其言论如此。

陕西靖国军的兴起与解散

1918 年（民国 7 年）1 月，胡景翼所部张义安举兵三原，覆陈树藩部曾继贤、严锡龙军。胡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自任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三原旧县府）。曹世英亦自陕北驱所部至。卢占魁率内蒙骑兵数千与三原兵会。长安以西则为郭坚所占领。高峻则占领白水、韩城及沿河各县。樊钟秀亦率河南民军战于省南，并袭击潼关。由是陈树藩乞援河南，刘镇华率镇嵩军万余人入陕。阎锡山兵亦渡河来扰，渭河南北相持不决。靖国军诸将领决推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与南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之师相呼应，先后遣使至上海迎先生。先生因偕王玉堂间关入陕，誓师讨逆，统一陕西革命军事，宣传三民主义，以树立西北革命之真实基础。其时军队有郭坚、樊钟秀、曹世英、胡景翼、高峻、卢占魁共 6 路及惠又光军约一旅，分屯渭北省西，张钊（河南铁门镇人）为副总司令，井勿幕（蒲城人）为总指挥，此陕西靖国军之由来也。

陕西靖国军兴起后不满 4 年即解散^①。其原因据说是军饷无着。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由于靖国军孤立渭北，与北洋军阀的恶势力苦斗数年，前途渺茫，各将领都有保存自己力量的心理。其中以第四路胡景翼投靠直系北洋军阀吴佩孚最为显著。因此，靖国

^① 一说于右任于 1922 年 5 月 31 日在凤翔杨虎城军中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解散以待时机，陕西靖国军才就此结束。

军解散之前，广东护法军政府孙总理虽有任于先生为靖国军总司令的委状到陕西，于先生早成孤立。当时苦闷地每日到民治小学校园休息。以 40 天的时间做成《民治校园纪事诗》20 首。第一首的第一句是“祇余民治园中路”，说明自己处境之艰难，已经无路可走。最后一首的结语是：“难忘民治园中路，卷土重来未可知。”先生一生的处境，坎坷甚多，但从来未曾灰心，总在奋斗中求光明，此先生之所以为英雄为豪杰也。

靖国军解散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第四路司令胡景翼在三原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我和我们民治小学几位教职员同往参加。胡景翼全副武装是个高级将领的打扮，他登台后对群众说：景翼是个军人，并不怕打仗，只因军费无着，才受别人的改编，如果各位能想出办法筹措军费，景翼绝不走这一条路，请大家上台发言。上台发言的仅王亮甫二人，且都提不出筹饷的办法。那一天台下座无虚席，每人 4 个包子的招待。我们心中不快，未吃包子，即离开会场。

胡景翼接受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改编，离开三原时，夜叩于先生家门请见，胡对于夫人曰：“一切实出于不得已，翼誓死不忘右公也。”

靖国军解散后的上海、北京行

1921 年（民国 10 年）冬，陕西靖国军解散。次年春，先生到武功杨虎城部队驻防地。是年夏，由此入川，东到上海。孙中山先生亦是年因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来到上海。先生见孙先生时，报告西北革命经过，并谢奉命之不力。孙先生说：失败何伤，吾亦失败来此也。

先生到上海后，以卖字得来的润笔维持生活。他在写就的纸上常盖“于思”二字的印章。“于思”是多须貌，《左传》上有“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之句，先生多须，人呼于髯。又因靖国军解

散而返沪，大有“于思于思弃甲复来”的象征。

先生后来担任上海大学校长。聘请的教授多是国内的名流，经常帮助他主持校务的是邵力子先生，社会科学系主任是瞿秋白先生，英文系主任是贺世贞先生。据说沈雁冰、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诸先生也在上大任过教授，这不是为共产党培养人才吗？人常说于先生是国民党的左派，我想他的思想根源可能来自《礼记》上的《大同》篇。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于先生极力拥护，就是都有共同的思想。孙先生常喜书《大同篇》中的“天下为公”四字，可以反映孙先生的思想。

1924年（民国13年），国民军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首都北京发动政变，禁锢贿选总统曹锟于团城。北京政府暂由政学系黄郛支持。一面请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来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一面请孙中山先生、于右任先生来北京共商国事。我为了民治学校经费问题急欲晋谒于先生，遂藉护送于夫人之便也到了北京。初到时住在三原会馆，这里是我县解元陈伯澜先生住家的地方。屈武先生正在北大肄业也和夫人于芝秀女士住在这里。后来于先生到了北京，我才移到府右街于公馆住宿。

那年的11月间，很多人都到火车站欢迎于先生，我也前往。先生下车后，群众拥护先生到了中国饭店举行欢迎仪式，礼毕后入座，欢宴的酒席不知有几十桌。先生入座后，左右观望，仿佛是找人的样子，接着他离席到处巡视。走到我跟前，我即起立。先生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坐下！我就是找你哩。”说后先生才去入座。先生平日对我处处关心，写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纵横。

于先生到北京后一月余，孙总理也到了。当时，段祺瑞担任了北京临时政府的执政。他正在召开善后会议，与孙总理主张的国民会议的精神相违背。国民党人不愿参加，于先生虽然被段邀请，当然也不能参加。因此我们跟随于先生坐车到郊外游览时，一定绕道不走执政府的门前经过。先生每隔一两日必到协和医院探

视孙总理的病情。孙总理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向各省都派有代表，陕西的代表是屈武先生。

屈武回陕后，对中山先生当时倡导的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主张，在西安、三原、耀县等地作了广泛的宣传。当时杨虎城驻军耀县，邀请屈武对全体官兵讲了话，并把极重要的机密函件托屈武带回北京交于右任先生。

那一年冬天的一个晴明的日子里，我们跟随于先生游览了颐和园。于先生游至排云殿时，想起慈禧娜用为巩固国防给海军筹集之专款修建个人享乐的颐和园一事，深有感慨。遂用怀中的自来水笔在殿内陈设的一件大型器物上，题了“排云殿外凭栏望，多事当年练海军”的诗句，讽刺慈禧太后。

我在北京期间，有一天，于先生在一家饭馆宴请胡适之、翁文灏、丁文江等几位学者，派我先去招呼，客到齐时，于先生也到了。先生也让我入座陪客。吃酒中间胡适之以轻蔑的口气说：“陕西人在北京发动政变的李自成以后恐怕就是胡景翼。”当时一般人对李自成的认识仍是传统的看法，认为是流寇。胡适之对陕西主人竟敢说出无礼貌的话，我当时只有 30 岁，尚有些火气，听到这些无礼貌的话非常生气，我看于先生是怎样的应付。先生冷笑了一下，大概感到“有理不打上门客”，遂把话题一转说：“这是陕西靖国军解散时，有一天晚上胡景翼来到我家叩门，我的女人出去接见，他对我女人说：‘我这回受人家改编，实出于不得已，请您对于先生说，我胡景翼誓死不忘于先生。’他同冯焕章这次约我到北京，大概是践他的誓言。因而我的诗中就有‘谁信李陵报故人’之句。”就这样的应付了胡适之。我从这次经过，对胡适之和他的著作完全失了信仰。

据闻，曹锟被禁锢之时，他的心腹大将吴佩孚正在山海关内外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作战。猝闻北京政变，即行回师。行至京津之间的杨村，被胡景翼部迎击。杨村一战，吴佩孚损失了几

个师，最后只带了残部 2000 人逃回洛阳。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派胡景翼率师入豫，吴又被胡击败，损失很大，不得已而退出豫境。段即派胡为豫省督办。民国 14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胡即因臂部疽疮而病故，归葬于华山之麓。我代表民治学校参加葬礼。见于先生怀着悲痛心情，亲笔写了一副挽联：“盖世勋名不为王翦，弥天风雨又哭中山^②。”先生生平待人宽厚，不念旧恶，认为胡既实现了他的“誓死不忘右公”的誓言，即不与之计较。仍以沉痛的心情写出这副挽联，予以褒扬，此先生所以伟大也。

民治学校创办的起源、扩充和结果

1917 年（民国 6 年）暑期，我由大荔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毕业回到三原，县教育局派我到西关第三国民学校任教员。于右任先生家住西关，据说先一年先生返里，西关父老欢宴先生。当席请求先生为这个学校帮忙，先生慨然应允。临返沪时，面嘱教育局长姚仲玉对西关小学特别关照，经费由他负责。我就是因此而被派来任教的。

是年暑假后，我到西关小学，当时该校学生只有 18 名，教员 1 人。

1920 年（民国 9 年）为响应世界民主革命潮流，先生改本校为“民治小学”。性质已属私立，但先生不许用“私立”二字，意在不是他办的。

^① 王翦是秦始皇的大将，富平人，先后率军攻破赵、燕，灭楚国。胡景翼因平日仰慕王翦，刻有“频阳将军是同乡”的印章。今胡景翼为中华民国立功，胜于王翦为始皇一家立功，故曰“不为王翦”

^② 明初大将军徐达卒后，追封中山王。胡景翼仰慕徐的为人，因而亦号中山。这是胡亲自对我讲的。于先生哭了孙中山之后，又哭胡中山，表示对革命人物哀悼之深。

民治小学的学生年年增加，教职员也年年增聘，须得一位有资望的人来任校长，校务才能推进。我向先生建议请王麟生先生来任校长。王先生是于先生的同学，辛亥革命前与邵力子先生在上海于先生创办的《民立报》报馆共事，又在西安高等学堂同任教员。王学品兼优，素孚众望。先生采纳了我的建议，就请王先生来任校长，我们开大会欢迎。因此，我们再修建了几座校舍，以容纳再增加的学生。1923年我接任校长。

1933年（民国22年）我在西关小学前后服务了18年之久，已经有些不感兴趣了。那年冬季，我到南京向于先生辞职，先生对我极为谅解。问我：“你准备叫谁接你的事？”我想不出相当的人。最后先生想起张守约，问我有无意见。我无意见，才决定请张守约任民治小学校长。我只担任民治小学、斗口农场两处常务董事，常住三原，并办理于先生在本县的其他公益事业。

由1936年（民国25年）起，民治学校有了初中班。校舍已不敷用，就在校外渠南购地扩建。记得我送先生返沪时，走到径河岸上，我问先生这个庄基讲定后，写契约时，就写在先生的堂名下^①。他说：“不敢！不敢！谨防留下祸根，使我的子孙将来争夺家产。最好写在民治学校名下。”这就为扩建民治学校打下了基础。

民治学校在渠南扩建校舍，修建两层大楼一座，上下共16间课堂，门房东西各一座，汽车可以出入的大门道一间。院子外围有新修的围墙，并将原有高楼子修理一新。民治学校北院大礼堂（原系三官神殿）隔砌为会议室和5个办公室。用款约计5万元（有些建筑材料由京沪运来，尚未计算在内）。

1949年（民国38年），大陆尚未完全解放，于先生已赴台湾，

^① 过去殷实之家都有堂名。如三原县东关胡德厚堂、胡德英堂，东里堡刘述经堂、刘三省堂……

民治学校经费完全无着，遂决定将中学交专员公署接办，小学交县人民政府接办。由我代吴伯坚校长办移交，专员公署和县人民政府派员接收，约计一个月的时间，才把手续办清，我才脱离了民治学校的责任。总计我对于这个学校发生密切关系，前后约有 32 年之久，也是我半生精力用之地。

注重地方教育

先生注重地方教育，并不由创办民治学校开始，也不是专办民治小学和民治中学。据我知道的事实列举如次：

在辛亥革命前给本县小学竞赛考试寄奖品 清末时，我县教育局举办了一次小学生竞赛考试。我已 15 岁，由私塾转入学堂，也参加了这次竞赛考试，也得了练习本、铅笔、橡皮。据说，这些奖品是于先生由上海寄来的。

给全县小学筹备基金兴办教育林 先生不愿把自己的力量完全用于民治小学。在办民治小学期间，托农业专家段兆麟（字瑞生，三原北塬上人，北京农大毕业，到美国考察过农业，任过几个大学的教授），在本县北塬东西段村附近购买坡地约 400 亩，广植泡桐，发育较快，木质又好。准备将来成材后，每年以泡桐售价所得，分配给全县小学作补助之用。由专人段警斋负责管理。每年我至少前去察看一次，解放后由公家接管。

为培养本县大学生成才设右任奖学金 此项工作由县教育局约聘地方人士组织委员会主持之。对本县在国内各大学的肄业生每学年的成绩优异者，根据学校发给的成绩表择优授奖，开会时我常参加。茹护法（现任陕西省教育学院顾问）、张象贤（现任铁路工程师）经常得奖，教育局有案。

介绍陕籍青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时，陕籍学生杜聿明、关麟徵等约 50 名由于先生介绍考入。后来于先生同来宾谈及此事，他说当他介绍这些学生时，用了两个革

命口号，写了一副对联给蒋校长送去。上联是“登高望远海”（打倒帝国主义），下联是“立马定中原”（打倒军阀）恭维中含着慰勉。蒋校长看后非常高兴，对录取学生的负责人说：“于先生送来的学生全部录取。”

于先生准备为我县筹建一所图书馆。先生曾对我说，他在上海藏有数量可观的图书，将来在本县修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把它运回收藏起来，再搜集些书籍充实充实，以供我县知识分子阅览，地址以靖国军总司令部为宜。

为了修建图书馆，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附设在山西街县参议会内。开始拟定名为“右任图书馆”，于先生不许，改为“渭北图书馆”。于先生寄来一笔款，预购建筑材料，先订购青砖 30 万块。在三原解放的先一年，我交涉好火车皮先将 10 万青砖运回，储存在尊经阁外围。后因时局的变化，修建渭北图书馆之计划未能实现。

三原女子中学的设立也与于先生有关。1931 年（民国 20 年）于先生旋里住在民治小学。我校女生毕业者 10 人，到西安上女中有种种困难。这些想上女中的学生请于先生解决她们的困难。凑巧那一两日教育厅长李范一来三原晋謁于先生，先生为这个问题同李谈了个大概，嘱我再同李细谈。李说：“今年的预算已经成立，不能改动。”最后决定先在省立第三中学设立一班女子初中班，把民治小学毕业的 10 个学生，连东关女中的一年级学生并为一班。以一年增一班，三年后即可成立一所女子初级中学，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果然三年以后，就在城隍庙街当年的大公馆出现了陕西省立女子中学。因此说，三原女子中学的设立也与于先生有关。

西北农学院的创建，于先生是首倡者之一。1931 年（民国 20 年），陕西大灾荒后的一年，于先生春季由南京回陕住西安，我去招呼。有一天，他约绥靖主任兼省主席杨虎城将军，还有几位知

名人士前往宝鸡，参观渭水流经的宝鸡峡和武功农学院筹建的情况，我也跟去。看宝鸡峡时，他们说：“这要请水利专家设计筑坝，引水灌田，以防再有荒年。”因为是先看一次再想办法，故只是说说而已。回到武功农学院筹建处，那时仅有新挖的几面窑洞，供筹备人员居住，尚无一间房屋。在吃饭时，仅有一桌，我也参加。于先生在吃饭时说：“武功是周武王伐纣用武成功而命名的。《诗经》上说：‘周原膴膴 萑荼如飴’，膴膴是肥沃的意思，萑是一种野菜，荼是苦菜，飴是糖。就是说这个地方土地肥沃，野菜如糖。周的先人后稷，就在这个地方教民稼穡。武功原有后稷庙，纪念这位农业的创始人，本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这里创办一所农学院，以纪念这位农业专家，不是更有意义吗？韩城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出生地，将来在那里创建一所历史学院，以纪念史学家司马迁，不是也有意义吗？”

吃饭后，筹备主任王子元送来工程师设计的农学院修建的一份图纸，据说全院面积占地 500 亩。我在旁边多嘴说，再加 40 亩就是一方里。大家把图纸看后交王主任带走时，当面叮咛，请工程师再加 40 亩成一方里。后来农学院又修了一座大楼，据说是于先生介绍上海建业公司修的，工料费共计 30 多万元（那时初行法币，同现洋价值差不多）。

出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

1926 年（民国 15 年），刘镇华领的镇嵩军困西安达 8 个月之久。城内由杨虎城、李云龙、卫定一三位将领率部苦守，城内军民饿死者三四万人，为数千年来未有的浩劫。当时三原县城也被围约 80 日。久困缺粮，急盼冯玉祥将军率领的国民军由甘肃东开解西安、三原之围。冯自五原誓师后于 9 月 20 日委任于右任为

① 一说 1932 年秋成立建校筹备委员会，校址定于武功张家岗。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并将队伍开到甘肃，但因同甘肃马家没有讲好，不敢东开，惟恐遭其从后袭击。其时于先生为了早日解西安、三原之围，从中说服马家，让马鸿逵队伍共同东开。冯部孙良诚、刘汝明进军到咸阳，以轻骑绕终南北麓至敌后，猛击之，敌主力全溃，城中出兵夹击，刘镇华率残部遁出潼关而西安围解，三原城外之敌亦遁去。因此说西安、三原之解围，于先生也出了大力。

三原解围后，于先生回到三原发起慰劳冯、马两将军的募捐运动，我也参加。募捐工作结束后，先生往耀县药王山休息。未久即经国民党中央决议和陕西人民的拥戴，在西安成立驻陕总司令部。

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不到半年，因国内政局又变，即冯玉祥跟着蒋介石反共清党，与蒋合作。接着南京蒋介石政府与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合作”了，历史称“宁汉合流”。后来南京政府改组，于先生任审计院长（后改为监察院，审计院改为监察院的直属部），直到大陆解放时，于先生被胁持去台湾，始终未能离开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岗位。

发动清河改道工程

三原县城地跨清河南北两岸。河道系太古时代洪水所冲刷之深沟。河水西来，紧靠西门外南岸东流。崖岸土质疏松，经常陷落，民房时有倒入河沟之虑。岸上泾惠第二支渠，下游灌田 5 万亩，东西大路紧靠渠的北岸，距河岸边只有几丈。河岸如果陷落，祸及渠、路，不但农田不能灌溉，且交通大路亦必中断。

因此，1929 年（民国 18 年）陕西大灾荒期间，于先生为救灾回到三原，同泾惠渠创始人李仪祉先生商定用华洋义赈会存款，以工代赈，约集西关、西秦、北秦三处农民，将西门口北岸老虎鼻梁凿开，让河水改由新道东流，因旧河道南岸比较巩固，减轻上

述各种危险。新开的河道，岸高约计 20 余米，两岸略呈坡形，河道水面，约宽 3 米，河道长约 100 米，凿成以后，河水即由此东流，腾出旧河道连同两岸坡地，约计 100 亩，可以栽果树、种田禾、务蔬菜。

清河改道工程成功后，附近群众正在高兴之际，不料次年（民国 20 年）暑期，多年来少见之大洪水汹涌澎湃而来，水由稍东之龙桥上面两边市房窗门中流过。河滩居住的民众均遭水灾。新开河道也被泥沙壅塞。那时我任民治小学校长，即用于先生汇来之赈款约集西关农民张志高等多人，将泥沙壅塞的新河道再行挖开，使水东流。

救灾救难赈济乡党

1932 年（民国 21 年）春，虎烈拉瘟疫（霍乱）在陕西各处流行。于先生在南京得知后，立即委托于夫人带十滴水、二天油、八封丹、万金油等药 10 余大木箱回陕住民治学校进行防疫工作。夫人到三原之次日，即约请普济医院伊添石院长、博爱医院阎子龙院长、三中教员侯文博先生到民治学校礼堂开会，研究防疫进行办法。民治学校教职员和年龄大的学生也有参加协助的。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派来汽车襄此义举。办法决定预防和急救同时进行。次日立即分途出动，白天在三原、泾阳城乡进行，下午在民治学校礼堂给附近群众注射防疫针并施药物，忙了多日才告结束。泾、原两县，是于先生的父母之邦，自然首先得到救济，其他各县如何进行，我不知道，但知上述药物给榆林运去几大木箱。这次防疫的经过，现今 70 岁以上而不是健忘的人，都能乐道一二。

先生赋性仁慈，因而对于地方赈灾也极重视，在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当时我才 6 岁，陕西大饥。先生才 21 岁，已经中举，就被推为本县舍饭厂的主任。地址就在西关渠岸三官庙内，即现在民治学校的北院。我在西关小学开始服务时，那里的父老多能

言之。民国 17 年下半年，陕西又进入了灾荒时期。那时我由南京回到三原，粮店里小麦老斗一石（约重 300 市斤）涨到现洋 27 元（平时一石是七八元）。第二年最为严重，往外逃荒者日多一日，饿死者时有所闻。先生为陕西筹募赈款，在南京有关的会议席上，往往痛哭流涕地代全陕饥民呼吁。关于全省赈款的数目，我不清楚，关于三原的赈款我是知道的，因为是我经手办理的。每一次的赈款都先汇到我的名下，由我转交县赈灾会。给全县的赈款多是 1000 元。关于先生馈赠亲友的救济费，我都遵照先生指示的数目，分别送交本人。本县在学校的先生，不是举人便是秀才，在那几年中都有钱馈送，对西关的饥民普遍只放过一次赈款，是我校教职员共同办的。每次办后，我都列表连同收据粘存簿一并寄往南京报销。前后四五年间，这种报表共计装了 5 册。有一次先生回三原，我送交他看，他略翻了一翻说：“这些报表赶快烧掉，勿令我的子孙看见。”我不忍烧，仍旧保存。直到他往台湾之前又来亲笔信，叮咛此事，我才把它烧掉。这样荒年以来，前后四五年中，先生在泾、原两县共花了多少钱，惜乎我没有总结，现在不能估计。

1929 年（民国 18 年）7 月，于先生为其长子武（即望德）在上海一品香举行婚礼时，在答谢词中提及陕灾严重情况。他说：“我本拟早日回陕看看灾情，因足病未能即行，并非在沪上待儿子的婚礼。久抱与家乡父老饿死同饿死的宗旨，并谢亲友送礼为陕助赈的热诚。”先生在儿子婚礼喜事的场合，竟提及陕灾问题，证明他内心无时不关怀家乡人民之饥饿。

斗口农场的创建和结果

于先生创建斗口农场的动机，据我了解有他的远因和近因。远因是他的祖先是泾阳县斗口于村的农民，亲戚也是农民。他长大后，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全靠农业。他住家的地方是三

原县西关，那里几乎各家都是农民，各家的生活全靠农业，为其他各关不尽有。近因是民国 18 年的灾荒过后，泾惠渠行将开成放水灌溉农田。先生年纪日老一日，对自己不能不作退休的准备。因而在 1931 年（民国 20 年）泾惠渠放水之前，即著手以祖遗田地 300 亩作为农场的基本耕地，由农业专家段瑞生介绍长安辛泉逸任场长。修房屋、买牲畜、买农具。以一部分土地种植麦棉，以一部分土地栽植苹果和其他果树。并在院内外空地栽植花木，一切设施务求能为人民起些模范作用。不三年而规模略具。后来辛泉逸辞职，仍由段瑞生介绍河南汲县果树专家杨蕴章任场长，继续整顿和扩充。场中建设费用和职工的工资，全靠于先生筹汇，情况有些紧张。经几位专家向于先生建议：要使农场事业稳定和发展，必须扩大土地，使农场本身能自营自养方为上策。先生一再考虑不能决定，恐怕他的部下或别人看他的样子，购买贫民的土地，扩充自己的产业，使贫民失去土地而无法生活，给国家社会种下恶因。后来又感觉到不扩充土地，农场就不能自养。乃先立生前遗嘱，然后再买土地。遗嘱全文是：

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村农事试验场。

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农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

这个生前遗嘱的石刻（先生亲笔写，长安名手王尚玺刻石）竖立于农场第二办公室前。在解放以前红军驻泾阳安吴堡时，听说刘伯承、贺龙来斗口农场游览，都是看过的。

遗嘱石刻竖立之后，先生给我们指示，先组织一个购地委员会，进行购地事宜。并叮咛提高地价，有人找我们时再行商量，不要去找人家买地。我们遵照先生的指示，谨慎从事，以无伤先生的大德为原则。其时荒年已过，逃荒者逐渐归来。有改业者，愿

将自己的土地卖出一部分。也有外地的人，趁荒年地贱，在斗口于村附近购买了些地亩，但不愿把家搬来在这里种地，地价既然提高，情愿把买来之地卖给农场。截至解放以前，斗口农场土地约计 1200 亩之谱，杨蕴章场长辞职后，刘鲁堂接替场长，最后场长是刘多桂。解放后，由公家接收。

场中果树最引人注意的是苹果，这些苹果苗子，都是先生由外省购就寄来的。记得 40 年前，陕西棉业改进所所长渭南李国桢先生曾对我说：“陕西的土地气候，适于栽植苹果。将来苹果出省与棉花一样的多。”盖当时陕西境内的纱厂仅有大华、申新两家，故多数棉花出省销售。

先生自办斗口农场以来，究竟花了多少钱，我未统计，但我知道先生在世并未用过场中现款一分一文。每次回来，场中只供给些青菜水果。最后回来两次，才供给少数面粉。

先生创办农场的动机，前边已经说过。一方面为了改良农业增加生产，作示范之用；一方面因自己日渐衰老，作退休的打算。大有“使营菟裘^②，吾将老焉”（语出《左传》）的意味。他在解放以前曾将自己在南京、上海收藏的名人字画和珍贵的古书陆续寄回，嘱我送交农场保管。这说明了他为退休时住在农场做准备。不料后竟被胁持流寓台湾，不能见大陆，不能见故乡，心中苦闷达到极点。因而他在绝命辞中，不顾一切地唱出：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这种发自肺腑的哀音，读之令人感伤。

① 斗口农场现为陕西省棉花研究所。

② 菟裘：春秋时鲁国的地名，在泰山梁文县南。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台湾当局应当顺应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思念大陆、渴望早日回到故乡的愿望，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接受中共主张，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日夜默祷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迎先生灵柩，归葬于斗口农场祖茔。虽不能生前在此养老，遗骸能归故乡，聊慰先生在天之灵。“地以人重，人并地永”。使斗口农场成为于右任先生永久纪念之地。

我对于先生个性的几点认识

于先生有好客之美德 我追随于先生 30 年之久，无论在三原，在西安，在北京，在南京或在上海，每一顿饭必定有客。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座中只是他们一家人而无一客者。先生每次回到三原，日日宾客盈门，所谓门庭如市，并非过甚之词。以民治学校北院地方之大（24 亩）前前后后都是客人。特别是 1931 年（民国 20 年）上半年先生回家住民治学校北院时，宾客最多。厨师六七人，早饭开到中午。座上来宾不一定是我们留饭的。我仿佛是个招待员，来宾自动入座，我不好阻止，以免伤先生好客之美德。据说有少数不速之客，饭后出门遇见熟人必曰：“于先生留我吃饭。”好像是“一登龙门”有声价十倍之荣。而先生对此不加可否，因此人皆服其伟大也。

于先生雅好山水并嗜花木 先生身在政府，心在山林。生平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风景区他都要游览。记得 1924 年（民国 13 年）秋冬两季，我在北京。先生几乎每月都领王陆一和我到京西各处名胜区域游览。

先生是诗人，非常爱好花木。有许多园艺专家同他谈话后，都惊其对花木知识之丰富。在靖国军时期，我们民治校园中花木多经先生指导栽培。大型的如喜马拉雅山的雪松，日本的樱花……小型的如落叶兰、郁金香……就九月菊花而论，就有百余种（后